

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

洪大用^①

摘要：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事实应该是具有社会影响的、激起社会反应的环境事实和具有环境影响的社会事实，应注意区分局部的事实与整体的事实、静态的事实与动态的事实、统计的事实与感知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与建构的事实。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需要充分体现社会学的视角，需要有清晰的反思意识，不断扩展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对待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演化趋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护环境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对环境相关的重要社会主体进行分析、对待理论导向的研究和政策导向的研究等方面，环境社会学者应该有正确的价值立场。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社会事实；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 (2017) 01-0078-15

本文先从近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讲起，然后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环境社会学所关注的事实；二是把握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种趋向；三是直面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和隐忧

在整个中国社会学大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的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在快速发展。我曾经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界，把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分为之前和之后两个大的阶段。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非常不系统，学科意识也不强，介绍的理论也不多。我记得最早接触的文章是北大卢淑华老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的一篇文章，还有麻国庆教授的一篇文章，他们都是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的研究，但是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环境社会学的学科意识。真正将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进来，然后以这个学科的视角来开展系统研究，还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顾金土等人在 2011 年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中提到“2000 年以前，我国学者发表了 15 篇（环境社会学方向）学术论文；2000 年之后（约 2000~2010 年），共计发表 155 篇，其中前 5 年发表 34 篇，后 5 年发表 121 篇。”^① 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2015 年中国社会学学会编辑《中国社会学年鉴》时，请我写一个关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评述，覆盖时间段正好是从 2011 年到 2014 年。我请我的学生龚文娟做了一个文献检索，主要以“环境社会学”和“环境与社会”为检索词，检索范围覆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当当图书网中所收录的论文和专著。剔除重复和明显不符合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义的文献，最后汇总出期刊论文 333 篇，硕士论文 122 篇，博士论文 26 篇，专著 38 部，共计 519 篇（部）学术研究成果（参见表 1）。很明显，最近几年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整体态势都不错。这里面博士论文就有 26 篇。相形之下，在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学界以环境社会学为主题

^①作者简介：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100872）。

^②顾金土，邓玲等《中国环境社会学十年回眸》，《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做博士论文的非常之少。

表 1: 2011~2014 年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内容分布

归类	篇(部)数	百分比(%)	
理论与方法	46	8.9	
经验研究	专项环境问题	117	22.5
	环境意识/环境关心	39	7.5
	环境行为/环境抗争	84	16.3
	环境风险/健康	41	7.9
	环境信息传播/环境组织	35	6.7
政策研究	119	22.9	
研究综述	38	7.3	
合计	519	100	

但是,深入地去看,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隐忧。在这个表格中,我们将 519 篇成果按照理论与方法、经验研究、政策研究、研究综述四大块进行划分。^①这样一来,“理论与方法”部分所占比重很明显是偏低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只占总文献的 8.9%,这对学科长期发展的支撑是不够的。“政策研究”与“经验研究”加起来,占比达到 83.8%,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和专项环境问题、环境行为与环境抗争研究等领域。大概可以说,基础理论研究与经验政策研究的失衡是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持续发展的最大隐忧,在经验研究方面对环境社会学所应覆盖的主要领域的关注,也还不是很均衡。这也体现出,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是不够成熟的。当然,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很重要,特别是在训练研究生的时候是很有价值的,有利于学生练手和发表。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很薄弱,对事关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认识不清晰,必然会影响这个学科发展的后劲。因此,本文想围绕环境社会学的三个基本问题谈点认识,这就是事实、理论和价值。

二、如何理解环境社会学所关注的事实?

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杜尔凯姆曾经指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事实的。社会事实大致可以理解为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同时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种种社会现象或行为方式。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也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但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R. E. Dunlap)认为,杜尔凯姆所代表的社会学过于强调“社会事实”,实际上是强调“社会”的事实,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之基础的生物物理世界,也就是环境事实,由此导致社会学研究对环境维度的严重忽视以及在生态危机面前社会学者的集体失语。邓拉普主张将环境事实带回社会学研究当中,要系统地分析环境与社会互动关系,并藉此开创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邓拉普等人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这种努力促使传统社会学更多地关注环境事实,并为环境社会学这门分支学科奠定了一个意识形态基础。

但是,深入地看,环境社会学在何种意义上关注环境事实,这还是充满争议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环境事实的研究和报道。例如,我们国家每年 6 月 5 日前后都会发布环境状况公报,报告大气、水、固废、噪声、自然生态等方面的状况。根据《2014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大气环境方面,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 161 个城市中,有 16 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

^①当然,分类取向、分类标准也对所发现的事实有一定影响,但是作此划分还是经过了比较认真的甄别。

^②在一开始,邓拉普使用“Environmental Sociology”,是有重建整个社会学的意图的,但后来他也默认了环境社会学只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事实。

达标, 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全国有470个城市(区、县)开展了降水监测, 酸雨城市比例为29.8%, 酸雨频率平均为17.4%。在水环境方面, 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 I、II、III、IV、V、劣V类水质断面分别占3.4%、30.4%、29.3%、20.9%、6.8%、9.2%, 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在4896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 水质优良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0.8%, 良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25.9%, 较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8%, 较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45.4%, 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6.1%。在生态环境方面, 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一般”。2461个县域中, “优”“良”“一般”“较差”和“差”的县域分别有558个、1051个、641个、196个和15个。生态环境质量为“优”和“良”的县域占国土面积的46.7%, “一般”的县域占23.0%, “较差”和“差”的县域占30.3%。

很明显, 以上这些环境事实是经过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和监测发现的, 在此意义上, 它们也是经过社会建构的环境事实。作为社会学者, 要关注这些环境事实, 其实主要是一个相信不相信、赞同不赞同的问题, 你不可能具有专业知识去识别和分析诸如雾霾、水污染之类的环境事实。在这一点上, 作为专业人士的环境社会学家, 其实跟普通公众没有多大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 以邓拉普为代表的环境社会学家, 基于经验的感知和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 主张应当相信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是真实的, 这种观点可以叫做实在论。与之相对的观点, 则多少回避了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是否真实这样的问题, 而更多地强调这样一种状况的社会建构过程, 这种观点可以叫做建构论。建构论与实在论之争, 是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主要争论, 涉及学科本体的认知问题。针对这种争论, 邓拉普批评建构论已经走得太远, 走向了不可知论的误区和对现实持有的犬儒态度。

作为一名普通公众, 我相信环境状况的恶化是真实的; 作为一名环境社会学研究者, 我也相信其是真实的。在此意义上讲, 我是一个实在论者。但是, 作为社会学者, 我确实无法准确判断环境事实的真实程度, 我更有可能关注的是特定的环境状况如何被认为是成问题的, 在多广的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成问题的, 其对社会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并激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应? 比如, 你说空气有污染, 我在知识和技术上不好判断, 但是我有经验感知, 而且社会学的方法可以让我了解到究竟有多少人认为空气污染是个严重问题, 都是哪些人认为是问题, 各社会主体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像个人戴口罩啦、买空气净化器啦、抗争啦, 以及政府出台政策治理空气污染啦, 等等。我认为, 环境社会学应当着重关注这些方面的“事实”, 这些其实是社会事实的一部分, 但是, 它们是因为特定的环境状况而引发的。所以说, 环境社会学自然要关注环境事实, 但实际上只能是关注环境因素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或者说, 我们所关注的只是那些可以观察到社会影响和反应的环境事实。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环境社会学也试图关注具有环境影响的社会事实, 试图从社会、文化和行为角度去探寻特定环境状况形成的原因。假定说我们承认水污染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那么水污染的物理化学过程我们是很难说清的, 但是我们可以调查污水排放的社会主体, 分析社会主体排放污水的行为逻辑及其背后的文化、制度和结构性影响因素等。事实上, 有不少基于环境与社会互动的预设所开展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 都试图在特定的环境问题与若干社会事实之间建立关联, 乃至因果关系。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 环境保护制度化水平及其效率, GDP总量和人均水平, 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文化与价值观, 等等, 都是常常被用来与特定环境问题关联的。目前有一个趋势就是将特定环境问题指标化、数值化, 同时定量测量若干社会事实, 运用回归模型揭示彼此之间的关联程度, 并发展出理论解释。这样的研究契合主流社会学的研究套路, 但是在操作化和理论解释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困难与不足。

如此来看, 环境社会学究竟研究什么? 是研究环境自身的运动变化吗? 我认为不是。但是, 如果抛开了环境事实, 环境社会学研究与其他的社会学研究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本人的研究体会是, 环境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现象时, 确实应当注意到环境与社会是密切相关、彼此互动的, 说这个预设也好, 公理也好, 大概都是可以的。在此基础上,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事实应该是环

境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交叉复合部分,即具有社会影响的、激起社会反应的环境事实和具有环境影响的社会事实,归根结底,他们还是社会事实,是环境影响在社会的投射和影响环境的社会因素。我们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把这方面的事实说清楚,把事实之间的关联解释清楚,以便更好地促进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协调。

在此意义上,我曾经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的一门分支学科。这样,环境社会学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就包括了社会主体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环境相关行为、环境问题对社会主体和社会系统运行所造成的影响、社会主体因应环境问题而做出的技术制度安排(与实践)和文化价值的转变等四个大的层次。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测量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 NEP 量表进行了检验和修订,提出了中国版的环境关心量表(CNEP),并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城乡公众对环境状况的认知与行为差异。特别是,我分别于2003年、2010年和2013年承担了人大社会学系“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环境模块的设计工作,所搜集的数据为量化地呈现中国公众环境关心和行为的社会基础、历时性变化(例如,表2)以及相应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支持。现在,这些数据都已按照程序向国内外研究者开放。同时,我也关注了环境问题社会影响的差异性分配问题,也就是环境公正议题。比如,即使像空气污染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影响的环境问题,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实际上也是存在差异分配的,并不完全像社会学家贝克所说“饥饿是分等级的,空气污染是民主的”。在北京浓霾蔽日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到外地躲避,还有一些人选择长期在海南之类的地方居住。即使留在北京,有的人购置了很多设备,防护措施严密,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条件,直接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遭受损害可能更大。

表2: 城乡居民对于不同类型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知

环境问题类型	认为居住地区该问题“严重”的比例(%)			
	CGSS2013 数据			CGSS2003 数据
	城镇	乡村	总体	城镇
空气污染	53.0	25.7	44.8	51.7
水污染	46.7	34.1	42.7	47.7
噪音污染	45.1	22.5	39.1	50.1
工业垃圾污染	42.1	26.5	37.8	42.8
生活垃圾污染	47.5	32.3	42.4	51.3
绿地不足	40.9	17.6	34.9	51.5
森林植被破坏	35.8	19.1	30.1	46.1
耕地质量退化	42.6	33.7	39.1	55.7
淡水资源短缺	38.4	29.4	35.4	43.5
食品污染	59.0	25.9	49.8	47.1
荒漠化	32.6	16.0	28.2	43.2
野生动植物减少	42.8	31.9	39.2	58.0

除了正确把握环境事实与社会事实的以上关系之外,环境社会学还需要注意所研究事实的不同类型。这里主要是区分清楚局部的事实与整体的事实、静态的事实与动态的事实、统计的事实与感知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与建构的事实。不同事实的选择不仅体现了研究视角、旨趣和风格,也影响着研究结论。

首先是区分局部的事实与整体的事实。对于环境社会学中所涉及的“环境”事实,很多时候被假定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危机,但是认识到整体与局部存在差异,有着多样化的“环境”

事实，这对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或许是更为有意义的。自从1962年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以来，直到今天我们讲全球气候变化，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的整体性环境风险被一再强调，环境社会学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分支学科。当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想象和建构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风险。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往往是局部的、具体的、差异化的环境事实或者风险。比如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一种整体性事实，但是不同地区所面对的威胁以及所感受到的风险还是有差异的，这也影响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形成。再比如，中国整体上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但是在一些地方却是水源充足，没有缺水的概念。所以说，关注整体性环境事实，在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之间讨论问题很重要。但是，要深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环境的认知和行为反应，也许应该更加关注彼此差异的局部性环境事实。与此同时，在整体环境衰退的情况下，也确实有局部环境改善的可能和案例，关注这种可能和案例，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给予研究者以希望，给予施政者以借鉴。我在2015年夏天去浙江安吉调研，对安吉的生态环境改善印象相当深刻，那个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很高，我很振奋，并且很想深入弄清做到这样的路径和机制，这是下一步要开始的工作。我认为，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无论是考察环境衰退，分析环境衰退的社会影响，还是研究环境衰退的社会反应，都要结合整体的和局部的事实。

其次是区分静态的事实与动态的事实。实际上，事实本身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着眼于这种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很重要。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问题，都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环境问题自身在发展，环境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也在发展。我们注重从动态的角度把握事实，一是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描述环境问题，二是能够看到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动态努力，三是可以对环境问题的未来发展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四是可以辩证地认识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有时候正是环境危机催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引导了新的发展方向，煤炭代替木材、电力代替煤炭，乃至今天追求更加洁净的能源，都是社会系统因应环境问题的选择，这种选择带来了生产生活的巨大变革。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选择了观察分析静态事实的角度，我们的视野就会受到限制，对于环境问题、环境治理以及环境与社会关系演变方向的分析判断，可能就会失当。比如说，如果忽略我国大气污染及其治理的过程和绩效，我们很可能就会因为当前大家关注的雾霾问题而对环境政策和发展道路作出有失偏颇的评价。如果忽略环境问题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对工业社会以来的环境问题的判断也有可能失准。实际上，每个时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都有相应的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的社会安排，环境问题自身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我很强调将历史的视角带回社会学研究，包括带回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我们需要重视环境史的整理和分析，对环境史的认识越清晰，我们的研究就越科学。在这方面，我非常钦佩日本学者舩桥晴俊的努力，最初他组织编写了日本的环境年鉴，后来又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了工业化以来各国环境事件、环境政策、环境研究等等，呈现出一幅环境与社会互动的动态长卷，这项工作对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再次是要区别统计的事实与感知的事实。任何学科的研究都需要呈现资料，资料和呈现方式的选择对于研究结果有很大影响。环境社会学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有很多，一方面有大量的各种来源的统计资料，另一方面也有反映社会主体认知和感受的描述性资料，这些资料代表着不同方面的社会事实。当我们需要描述环境状况时，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去引用一些权威的统计报告。比如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世界银行报告等等，我们会选择一些空气污染、水污染、固废污染、环境治理投入等等指标，报告环境质量状况和改善环境的努力程度。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所呈现的事实，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感知的事实是不同层面的，两者之间甚至是不一致的。统计指标所揭示的环境问题也许很严重，但是并不为公众所感知，而统计数据认为不是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是在不断改善的问题，公众主观感知到的却可能是非常严重。比如说，关于雾霾问题，应该说统计数据可以揭示出长时段上空气质量向好的趋势，但是公众主观感觉却是空气

质量严重恶化。又比如,统计数据呈现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及其严重性,但是老实说,中国目前有多少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问题呢?考虑到人们直接感知到的事实对其态度、行为和价值观念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环境社会学者似乎更应注重这种事实的发掘、分析和呈现,也就是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感受,而不能只是简单地依据统计的事实去进行分析。特别是在环境风险分析中,公众感知的事实需要予以特别重视,而不能偏信专家统计出的事实。比如,某地建设一个重化工企业,专家使用各种数据证明企业对周边环境无害,还会带来收入、就业、财政收入的增加,但是老百姓就是认为企业会造成污染。我们就不能轻易忽视或者否定老百姓的意见,说他们无理取闹、没有知识,这样简单处理往往就会加剧社会冲突。现在一些地方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既要重视统计的事实,也需要尊重并分析公众感知的事实,找寻更加科学合理的沟通办法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最后就是我们z需要区别客观的事实与建构的事实。从一个极端的立场讲,所有的事实都是由一定的社会过程、由相关主体参与建构的,科学发现也不例外。但是,事实又确有客观的一面,可以为人们所直接感知。比如,水被污染了,空气质量不好,到处都是垃圾,等等,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水是如何被污染的,空气质量是如何变差的,往往就需要专业知识进行分析。作为环境社会学者,对于此等详细事实的揭示难以做出太多的贡献。不过,究竟哪个环境问题变得重要,哪个环境问题进入了政策议程,环境问题对谁有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环境治理的成效如何,对诸如此类的议题进行分析,环境社会学可以做出应有的贡献。因为这里面涉及多主体的社会互动过程,而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分析则是社会学的长处。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固然要认真对待客观存在的环境事实和社会事实,但是也要充分重视环境事实、社会事实的建构过程。以一种建构的视角解析事实呈现的过程,揭示事实的性质,并不一定就是解构,就是否认事实的客观性,实际上也有利于强化某种事实的存在和传播。比如,当我们了解清楚远在南极的臭氧层空洞是如何引起关注的,我们就可以强化和利用某些建构技术,使得那些超出人们日常感知的而又客观存在的环境问题,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引起公众关注,并进而促进问题的防范和解决。

三、把握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种趋向

清晰地认知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固然很重要,但是要深化环境社会学研究,需要重视理论建构,而理论建构需要结合社会系统的运动变化不断扩展社会学的想象力,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话题:把握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种趋向。

我们可以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分析为例。关于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有很多理论分析的视角,我在这里试图梳理出一种发展脉络,当然也还存在着其他的分析进路。有些学者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看,认为国家、企业家和大家(公众)是导致环境衰退的三个重要主体。就“国家”而言,像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家的合谋,加剧了环境破坏。有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政府开发导致了环境破坏,还有人认为,国家对于社会反应滞后,没有有效地推动制度变革,这也是导致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一个原因。就“企业家”而言,因为大量的污染是从企业出来的,所以企业家自然是重要的责任主体,而关于企业行为的研究就是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点。就“大家”而言,主要涉及公众责任。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并积极推动环境保护,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一个环境友好的社会。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都是别人的责任,那这个社会只能是互害性的、对环境不友好的社会。我在这里主要以环境社会学围绕企业行为而开展的理论研究为例,揭示其中存在的一种扩展社会学想象力的路径。

毫无疑问,企业活动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企业产品类型、技术水平、管理方式及其背后的环境意识等等决定了企业的污染水平,这种污染水平是可以客观监测的。当我们监测到企业污染,不管是污水、废气还是垃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企业真不像话,它怎么会污染环境呢,

管理企业的企业家真是没有良心，不讲道德。这样一种看法是从道德层面质问或者批评企业家，在理论上甚至可以指出企业奉行的是企业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相应的解决之道也就是要求企业养成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恪守环境道德，像台湾学者所说的那样，要在传统的“五伦”之外强化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就体现不出社会学的视角。

社会学的视角是什么？当然有很多种视角。我看社会学最基本的一个视角，就是把人、把企业都放在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去看待，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是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个人行为，企业行为，都是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行为。由此角度来看，企业排污问题就是企业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的一种理性行为，这样一种解释也叫做理性选择解释。企业排污不排污，不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而是在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遵循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当企业家发现排污获得的收益要高于不排污，那肯定就去排污了。其实，理性选择理论受到经济学的很大影响。经济学把企业排污行为概括为“内部成本外部化”：本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是要自己消化的，消化就要计入成本，成本提升，它的利润就下降了，竞争力也会下降，所以企业就将污染外排，由社会来承担成本，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这样一种理论视角所看到的解决企业污染问题的方案就是加强对企业行为的制度约束，促使其把环境成本内部化，比如说排污收费等经济制度以及关停并转等行政处罚制度等等。但是，在实践当中这些制度的有效性往往不足，现在还在探索污染的第三方治理等新的制度安排，国务院、北京市都颁布了相关文件。

顺着理性选择的思路，我们还可以接着发挥一下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分析企业行为，是否假定了企业是孤立的或者独立的行动者？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往往是与其他主体密切关联的。这种关联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深层的因素。环境社会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不只是一个独立的面对市场的，努力把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行动主体，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合谋，企业行动是一种联合行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家需要选票，需要选票就承诺就业，承诺经济增长，而承诺经济增长你靠谁，就要靠大量的企业家去投资、去创新。所以说，政府要去鼓励企业发展，这样企业的污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政府所容忍乃至包庇。只有在污染很严重的时候，影响到了老百姓的投票，政府才会选择对企业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史奈伯格是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就是阐释权力与资本、政府与企业的合谋，这种合谋使得政府与企业的利益不断达到新的平衡，而解决污染问题只是随机的，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他所使用的“苦役踏车”概念，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持续地、周期性地创造稀缺和不断扩大生产的内在机制，这样一种不断扩大的生产必然需要不断扩大的消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污染，也就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环境问题的基本逻辑。虽然史奈伯格的理论主要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行为，但是该派的学者也曾尝试运用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与政府、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实际上也采用了这种视角，或者说与之不谋而合。比如，包智明教授也在文章中讨论了基层政府作为经纪人的谋利取向，而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在讨论中国农村环境破坏的时候，直接就用了“政经一体化”的概念，指出一些基层政府的行为类似企业，甚至是一些企业的出资人、保护者，GDP的增加对于政府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和个人升迁机会等，所以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权力和资本紧密勾连，抑制了公众的声音，牺牲了不能言说的环境。^①

从分析层次上看，政治经济学视角明显更加深入，其结论对于现实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是，理论研究并不能就此终结。如果说把企业放进社会中研究体现了社会学的基本视角，那么，我们还应该看到企业所在的“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相应地，企业也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是所谓“大势所趋”。在这个意义上讲，西

^①张玉林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5期。

方环境社会学中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就正好揭示了这一点, 或者说是考虑到这一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的提出者在德国, 后来以荷兰环境社会学家阿瑟·莫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 对此理论发扬光大, 并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推介传播, 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作为一名社会学者, 他的博士论文却是关于一个企业的。他所研究的化工行业, 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代表, 而且是环境污染大户的代表。但是, 莫尔在其所研究的化工企业观察到, 企业自身正在“绿化”, 从技术开发、程序改进、规章制度建设乃至经营理念等, 都能看出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努力减少排放, 保护环境, 使自己变成一个干净、绿色的化工企业。莫尔认为, 这样的企业行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其他企业也可以发生类似的变化, 然后整个行业都可以发生变化, 并且可以带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发生变化。莫尔据此提出, 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是可以自我调整的, 未来的环境改革充满希望, 工业化和环境保护可以兼容,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可以双赢, 没有必要反对现代化, 没有必要呼吁“去工业化”, 这大概就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回过头来看, 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什么会观察到社会环境中的企业行为发生如此巨变呢? 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大势所趋”: 在大的社会转型进程中, 企业不这样做都不行了。为什么? 莫尔指出了五个主要方面的社会趋势: 第一是科学技术自身以及人们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原来很多人认为现代技术是破坏环境的, 尤其是大规模复杂技术, 所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流行过“小的是美好的”, 小型、简单的适用性技术被看作是一种可以替代现代技术的选择。这本质上是一种“去现代化”和反对技术进步的主张。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它的两面性越来越突出, 大家认识到技术不光是环境破坏的力量, 也可以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 尤其是像信息技术这样的先进技术, 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大家越来越赞成充分发挥这类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第二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市场机制和经济主体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市场已经不只是破坏环境的力量, 简单的行政管制并不一定真正发挥作用, 而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环境正在成为促进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大量生产之后, 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原来是卖方市场, 现在是买方市场。买方市场以后, 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就会对生产有很大影响。特别是, 当人们从小就学到要环保、要绿色, 那他就不买那些不环保的东西, 不买那些不绿色的东西, 就会发出强劲的市场信号, 迫使你供给侧进行改革。第三是民族国家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变化。所谓“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已经行不通了, 国家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样有力、有效, 单纯指望国家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是不现实的, 国家也有难以承受之重。环境治理需要由国家独治转向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 其中公众和企业都是重要的治理主体, 这样企业也就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期待。第四是公众社会运动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公众抗争不仅据有所谓的道德制高点, 而且被认为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 很多的社会运动总是与政府、企业处于对立状态, 跑这个企业堵门, 跑那个政府门前抗议。实践表明, 仅仅堵门、抗议是没有用的, 关键要找到出路。公众需要合作, 广泛的合作, 包括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 这样就给予了企业更多的激励和支持。第五, 也是最后一点, 莫尔指出, 形势比人强, 世道大变了, 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变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环境保护的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 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那种完全忽视环境, 或者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从根本上对立起来的做法, 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了。^① 国家不敢, 政客不敢, 企业家也都不敢这样, 如果这样, 或者丢掉选票, 或者丢掉钞票, 是犯傻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 各个社会主体都想探求一条出路, 让大家钱照赚、财照发, 还能保护环境。总之, 如此多方面的社会巨变, 意味着企业所面对并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环境

^① 参见 [荷兰] 阿瑟·莫尔, [美] 戴维·索南菲尔德 《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 观点和关键争论》, 张 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第 6~8 页。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只有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适应和发展。而解释企业和社会这样一种变化的趋势，就催生了生态现代化理论。

顺着这样的线索，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步，我们还有没有继续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行新的理论建构的空间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想象力无穷，理论探索也不会止尽。实际上，我本人针对中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曾经提出一个“社会转型论”^①，也可以说是对特定时空中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描述和解释，旨在探寻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过程如何引发了包括企业、政府和公众等社会主体的行为与价值观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可以说，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有时空特点的。莫尔讲生态现代化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实践，严格来讲，是基于西欧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实践。这样，聚焦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就是中国社会转型，一定会有新的理论发现。我提出的观点只是一个尝试，主要考察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转型与不断恶化的环境状况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未来出路。我采取了一种辩证的立场，既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转型进程确实加大了环境压力，甚至导致了环境衰退，但是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过程也孕育了缓解环境问题的机制和方向，一个政府、市场和公众等多个主体合作共治环境的局面正在浮现、形成乃至定型，并由此开辟出中国环境治理的特色之路。

把社会转型的时空维度考虑进来，我们还可以看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不足。我和我的团队曾经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做了一些研究，出版了专门著作。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实践依据主要是在德国、荷兰，放大一点，是在西欧，即使再放大一些，也主要是在西欧北美。很明显，这些地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是发达的一部分，他们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基于这种地区实践而提出的理论是否具有全球普适性呢，或者说可以解释和预测全球社会与环境变化的趋势？我看这里有着很广阔的思考空间。一方面，各个地区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社会经济体制与文化传统不同，人口与环境基础也有差别，是否可能出现生态现代化，或者将以何种形式实现生态现代化，这些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在深入推进，全球社会已经形成，全球社会密切联系、彼此依存，但并不是均衡发展的。西欧北美的生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全球性的生态现代化。甚至，西欧北美的生态现代化是以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和非现代化为基础和前提的。比如说，在加拿大，纸浆生产减少了，慢慢地不毁坏森林了，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巴西这些热带雨林地区的森林砍伐却越来越多，大量的纸浆厂转移到那里去了。包括美国，在金融危机时发现，自己的金融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脱节的，它的大量的企业和制造业都外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了。现在美国要重新复兴制造业，当然这种制造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归到原来的传统产业。这样说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了，进入了所谓生态现代化的阶段，但是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和价值观都没变化，把污染产业外移到全球其他地方，而全球其他地方的环境恶化支撑了他们这些国家的环境改善，或者说生态现代化。这些现象是互相关联、互为整体的。现在人们经常讲后工业化、后工业社会，我个人认为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始终是要谨慎的，需要考虑到是对谁而言。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是后工业化了、后现代了，但是在全球社会中，工业化还是进行时，中国目前是最大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等到哪天中国工业化完成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必然出现新型的工业化中心，比如像印度、南非之类的国家。因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其基本的工业需要在那里，建筑、交通、能源、日常生活等等，都需要依赖工业体系来满足，没有这个工业体系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工业体系不在中国，就可能是在东南亚；不在东南亚，就可能在澳洲；不在澳洲，就可能在南美、非洲……总之，这个世界是需要工业生产中心的。所以，我认为，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在全球范围上讲，工业化也许长期不会结束，至少在目前，它还是在扩散阶段。

^①参见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章。

当我们把时空因素考虑进来时,我们发现生态现代化理论还有不断改进的空间。我曾经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那就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演化,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开始认真对待环境问题,并谋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探索生态现代化的实践。但是,各国各地区所采取的模式可能是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不一定是沿袭西方的模式与道路。这样,生态现代化的西欧经验就会遇到挑战和质询,而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就必然迈向全球共构阶段。

事实上,我们在考虑时空因素时,已经关联到一个全球社会的概念。全球社会的浮现也可以成为我们拓展企业行为分析的新空间。当今时代的企业,不是孤立的企业,不是特定环境中的企业,而是居于全球网络中的企业。全球化的社会环境正在对企业行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然,不同企业卷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有所差异,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是跨国企业。我们现在研究任何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乃至研究公众价值观与行为,都应该考虑到其与全球社会的可能联系,脑子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全球的想象,一定要有全球联系、全球网络、全球社会的概念,要在这些概念中去分析问题。在这样一种视野中分析,相信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发现,甚至可以揭示全球化进程对于各社会主体,包括对于企业的复杂影响,以及其对于全球生态环境变迁的复杂影响。在此方向上,世界体系理论是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当然也是可能的理论创新方向。

我在这部分所强调的核心意思是,环境社会学者在面对社会现象时,需要重视理论建构,而理论建构需要有不断扩展的想象力,需要有清晰的反思意识,需要弄清楚别人是在什么层次上提出的理论问题,需要识别和把握自己理论分析的层次,然后建构自己的理论。我在这里主要是以有关企业环境行为的理论发展为例,做出一种角度的梳理。我相信在分析国家、大众等主体的行为时,也会有可以不断扩展的许多方面。

四、直面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价值”问题

最后我再谈谈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中“价值”问题的认识。社会科学工作者,乃至所有科学工作者,都回避不了价值选择问题。秉持何种价值取向,不仅关涉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材料的选择,而且影响到研究结论。作为科学工作者,不可能回避价值倾向,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申明价值主张。我以为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牵涉的主要价值取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选择和主张。

(一) 对待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演化是悲观取向还是乐观取向?

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对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前景持悲观取向还是乐观取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经常会被人问到,你怎么看待环境与社会演化的未来?这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来了。像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强调的是“增长的极限”,认为当下的工业社会按照现行的增长方式、增长速度,很快会走向它的极点,未来的社会将会崩溃,回到原点。而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观点强调“没有极限的增长”,认为所谓“极限”只是人自身的极限,环境自身不可能存在极限。在环境社会学的诸种理论中,譬如说人类生态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风险社会学理论,大体上都体现了一种相对悲观的价值取向,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明显强调了一种乐观取向。

对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未来,我想首先是不要一概而论,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整体性的环境威胁可能有其客观存在的一面,但是多少有着建构的成分。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环境常常是局部的、具体的。在这种经验当中,确实有些地方的环境与社会关系高度紧张,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环境与社会关系具有可调节性,未来前景是看好的,甚至现在就已经是很和谐共生的了。我最近走了一些地方,包括福建长汀、浙江安吉,我的观察让我觉得有些改变还是有可能的。前几年我也一直在讲,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体上讲非常难,而且注定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仅仅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而别的国家不建,即使我们建起来也持续不了。但是,你要看到在局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确实是有可能先行的。所以,我主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我还是希望采取乐观主义的态度,因为乐观意味着希望,意味着采取具

体行动是有意义的,甚至意味着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生下来注定将来是要死亡的。但是,小孩出生时,你去恭喜人家,说些恭喜祝贺的话,主人会高高兴兴。而你要悲观地说“这孩子迟早是要死的”,会让主人愤怒,大家也都不高兴。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这样,你天天说它有危机,没有前途,一片黑暗,其实大家也不乐意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为什么生态现代化理论出来以后,政府喜欢,企业家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就是因为它给人一线曙光,指出我们的发展没错,我们的现代化还可以往前发展,充满希望,生态理性是可以培育并融合到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它指出这条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比简单的悲观无为就要好得多。当然,也有一些理论不认为自己是悲观的,反而认为自己是激进的,是主张彻底变革的。比如说,政治经济学理论就对资本主义体制提出尖锐的批判,主张彻底变革资本主义体制,认为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倒认为这种主张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悲观和无奈,甚至为放弃局部的、渐进的努力找到了借口。我总觉得,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只要付诸努力,希望就是有的。比起简单地悲观,我更强调积极的乐观,行动中的乐观,建设性的批判。未来取决于当下的行动。

(二)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经济发展优先,还是环境保护优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不能简单设问、笼统而论。在最为基础、最为本质的意义上,如果必须做出回答,我还是倾向于认为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因为经济活动事关人们的生计,生计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环境保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实践中经常会遭遇到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问题。有时,蓝天白云固然好,但是为了蓝天白云要牺牲生产、牺牲就业、牺牲收入,最终是牺牲最基本的生活,这样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当然,可持续的生计要以可持续的环境为基础,在一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没有适当的环境基础,生计系统就要崩溃,这个时候环境保护还是具有优先位置的,为了可持续的生计必须保证环境是可持续的。进一步看,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的长期历史看,每一种经济发展类型都会造成相应的环境破坏,但是同时也发展出了相应的保护环境的社会安排。在游牧时代,没有牧草了,人们就会迁到新的有牧草的地方去,或者轮牧;在农耕时代,发现土地退化了,就要实行轮耕或者休耕。在能源方面,当木材资源短缺了,煤炭就被用作替代能源,而在发现煤炭污染严重时,就导致了电气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和使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只脚迈进了工业经济时代,我们另外一只脚还没有进来,我们还没有发展出完善的保护环境的制度安排。这不是要工业经济还是要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要两只脚平衡配套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经济活动破坏了环境,也为保护环境创造了新的机会和资源;反过来,环境保护也会倒逼经济体系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是有经验可循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看作是对立的关系,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这方面,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古人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我们真是希望有兼得的方案。作为环境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我们确实希望能够探索到具体时空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够实现双赢的路径,我们需要坚持为此而努力。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努力在实践上也是有可能的。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参见图1。这个图反映的是中美人均GDP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大概是在1973年人均GDP 461.74美元的时候,二氧化硫的排放达到了2880.7万吨,这是他的高点,然后就下来了。中国达到高点的时候是2006年,人均GDP 2069.34美元,二氧化硫的排放达到2588.8万吨,然后也在往下降。两相比较很有意思,就是说后发展的国家通过技术的进步或者利用后发优势,可以提前实现环境污染这样一个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到来。从一个方面来讲,也就是只要我们措施得当,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是可以缓和环境压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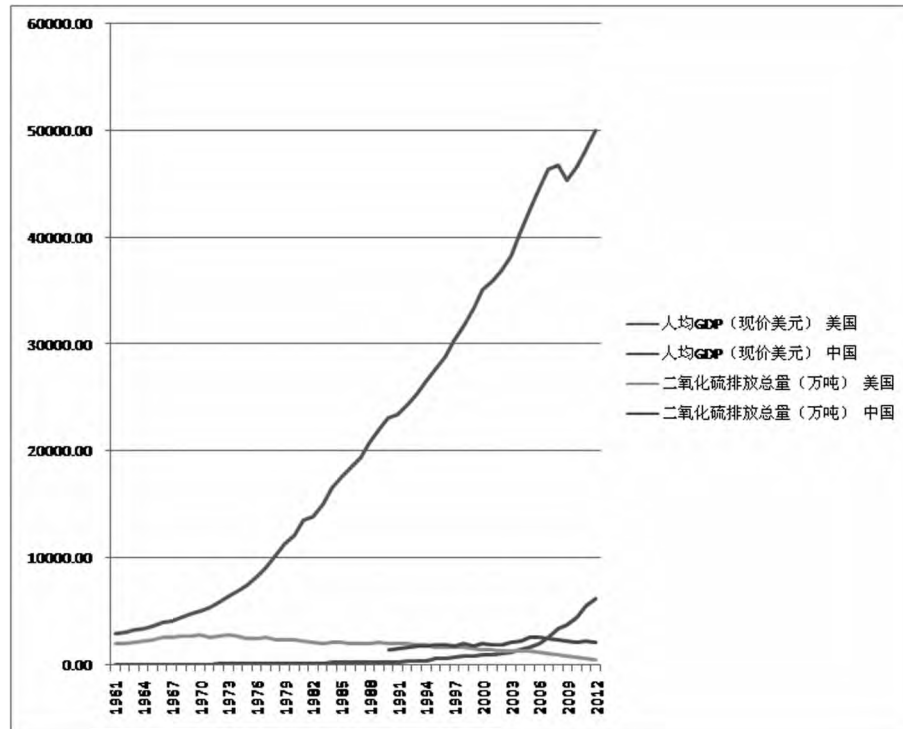


图 1: 中美人均 GDP 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变化趋势对比^①

(三) 如何看待保护环境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效率取向还是公平取向的选择, 或者说是关注整体还是关注不同群体的选择, 这些选择往往都是很难做出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现在全球各国都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 反复地沟通、博弈以谋求应对之道。全球气候变化之所以受关注, 因为它不光是关系到我们地球上 70 多亿人的整体安全, 甚至包括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的安全也受到影响, 最终有可能关系到整个星球的安全问题。所以要求大家要行动起来, 团结一致,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稳定气候变化的趋势。确实, 面对这样的整体威胁, 世界各国、各个社会 and 所有人, 都有责任做出努力。但是, 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 公平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说, 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排放占据了太多的环境空间, 现在却要以环境空间所剩无几为由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自身权利不相称的义务, 这样是否不公平呢? 基于不公平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 即使可能, 是否可持续呢? 我不认为不公平的合作可以持续。所以, 没有公平也就不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 最终也就没有效率。其实, 在国内层面也一样。整体而言, 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环境危机十分严峻, 对全体国民都构成了威胁, 但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从这种恶化环境的过程中的“获益”是有差别的, 其受环境恶化的具体影响也是有差别的, 其所能承担的环境保护能力也是有差异的。因此, 在应对中国环境问题, 我们需要关注社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乃至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当然, 在开发利用环境方面, 也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比如说要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 一方面需要强调协同一致, 通力合作; 另一方面, 也要考虑社会公平。要知道, 北京人收入高, 开着汽车, 住着好房子, 简单地要求周边的人做出牺牲以保证北京的空气质量, 这也是有失公平的, 周边很多老百姓也许还在等着开工挣钱盖房娶媳妇过小日子呢。所以说, 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不只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这样一个目标, 而是基于共享发展成果的全面协同合作。作为环境社会学者, 我们固然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 固然关心社会整体的安全, 但是我们的学科视角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产生、影响和解决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从分析的视角去看待不同族群的地位、利益与文化差

^①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 美国环保署网站, <http://www.epa.gov/ttn/chieftrends/>; 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http://jcs.mep.gov.cn/hjzl/zkgb/>。

异，特别是要关注环境不公平与社会不公平的叠加给弱势人群所造成的严重损害。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是有很大差异的，也是我们环境社会学者应当自觉的。

(四) 在对与环境相关的重要社会主体进行分析时，是否应当避免脸谱化的倾向？

通常在分析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时，一些人都会关注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重要主体，而且受一些西方学者的影响，常常对每个主体的作用有着刻板印象，习惯于脸谱化的分析。比如说对公民社会的过分美化以及强调公民社会与市场、国家之间的对立；比如说过分美化或者丑化市场的作用，宣扬市场万能论或者说市场失灵论；比如说过分期待或者过分看低国家的作用，宣扬削弱民族国家或者是强化国家的管制。我觉得这样一些简单化的、脸谱化的分析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同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到各主体“变脸”的一面，要注意考察各主体作用的动态变化，要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考察各主体的角色与作用。

事实上，人在变，社会也在变。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体制背景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会塑造不同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对其有刻板、抽象的理解和期待。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与现在的国家形态有很大差异，中国国家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也有着差异，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的作用也有不同，特别是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有很大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的国家不承认有环境问题，当时认为环境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的毛病，而现在我们的国家首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你能说这个国家的作用没有变化吗？市场也一样，也在发生变化，从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变成全国性市场、全球市场，从在资源配置中起补充作用甚至边缘作用的市场变成起决定作用的市场，从一个没有很好规制的市场变成一个日益完善的市场，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其社会作用和对环境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公民社会呢，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早期的行业协会、地下帮会，与现代意义上的社团是有差别的，现代的所谓“社团革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影响也大有不同，其在不同国家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也千差万别。所以，我们要历史地、具体地考察所谓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

进一步看，在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角色也存在着反串现象。比如说，现在经常讲社会治理，传统上，所谓社会治理就是国家在治理社会，但是现在市场、公民社会都参与社会治理，而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的很多事要靠非国家的角色来帮着办。同样，市场的运行也越来越不是完全自发自律的，很多时候，公民社会和国家也反串着市场的角色，发挥着参与经济事务、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的很多事情要靠非市场的角色帮着办。而公民社会参与国家治理和市场活动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国家、市场有时也反串着公民社会的角色。所以，在此意义上讲，国家也好，市场也好，公民社会也好，其边界往往不是那么清晰了，似乎是越来越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简单化地孤立分析各个主体，可能是脱离实际的。

仅就各个主体对于环境的影响而言，其实都不是单方面的。在很多时候，它们都有着双重面孔，无论国家、市场还是公民社会，都是如此。你说市场是破坏环境的力量吗？其实，市场机制也可以用于促进环境保护，目前的很多环境经济政策都是基于此设计执行的。你说国家是环境保护者，要强化国家的绝对权威和管制作用吗？且不说专制型“环境国家”可能会造成其他方面的社会损失，仅就环境保护而言，已经有不少研究表明，国家有组织的开发活动是破坏环境的重要因素。你说公民社会是环境的卫士吗？在一些时候，不成熟的所谓公民社会实际上是牟取私利的、妨碍环境保护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辩证地分析各个主体的角色表现。

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在经历着深刻变化，超越民族国家的市场、全球社会的兴起，使得各重要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种新变化，尤其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有些人大讲全球化、全球治理，主张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萨拉蒙指出20世纪的社团革命，具有跟19世纪民族国家诞生同样重要的意义，公民社会将在社会治

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弱化民族国家以及国家治理作用的声音主要来自西方,国内也有一些呼应者,“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则是这种声音的一个体现。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照搬这种观点,不仅违背我们的国家利益,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脱离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自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国家建设没有经历多少时间,国家建设的任务实际上还没有完成,海峡两岸至今尚未实现统一就是其中的一个缺憾。可以说,我们现在处在加强国家建设和调整国家角色的双重进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讲弱化国家的作用。实践表明,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国家仍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的、有效的主体。

(五) 如何对待理论导向的研究和政策导向的研究?

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学科,很明显,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需要重视理论导向的学术研究。我在一开始就讲到了,目前环境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薄弱,难以支撑这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也不利,所以我们学术共同体需要共同努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打好学科发展的基础。但是,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践,需要有指向实践的关怀。完全脱离实践的所谓“纯粹学问”,是否存在也许可以质疑,但是我觉得不应提倡。我想,大家对环境社会学感兴趣,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兴趣,而是也有着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促进环境治理的关怀。实际上,实践可以激发理论的灵感,实践也是检验、创新理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好,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好,都是对于经验的一种概括。中国环境衰退、环境治理的经验,为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概括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非常具有发掘提炼的价值。不过,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往往只是把中国经验作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理论的依据。这样也可以说是迟发展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但是我们需要尽快努力超越这个阶段,这就需要研究者的理论自觉。

不久前,我到福建长汀、浙江安吉和河北定州等地调研,既了解到一些非常具理论价值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也看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的继续改善。比如说,长汀这个地方是几十年的水土流失,曾经基本上都看不到树木了,山上光秃秃的。但是,在当地政府主导的一系列与生态修复有关的社会改革下,长汀最近一二十年变化非常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安吉这个地方呢,我看到他们不仅把生态保护得很好,而且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社会发展很好,人与自然很和谐,给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果说长汀是一个不太发达地区改善生态成功的案例,那么安吉实际上走过了先工业污染后环境治理的道路,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这两个地区的案例,其出现本身对于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意味着区域性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是有可能的。而深入研究下去,揭示这种成功背后的社会机理和学理,辨别其特殊性和一般性,就可以进行很好的理论建构,促进环境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并给与其他地区的实践以启示和指导。河北定州则是又一种类型的地区,这是仍处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地区,但同时又面临着环境政策日益严格的约束,也处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压力之下。深入研究这种类型的实践,对于检验生态现代化理论,或者提出新的理论构想,应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培育理论自觉、注重理论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是我所主张的。与此同时,我并不反对政策导向的研究,甚至主张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提升研究水平。不过,有一些倾向是值得注意的。例如,一是学术性不足,政策研究变成一般性的观点表达,甚至是个人价值观的宣泄,这样对于实际政策的设计和改进行是没有多大好处的,甚至是有害的。二是简单地,甚至一味地批评中国环境政策,始终以批判者自居,不能科学评估中国环境政策的效果,看不到中国环境治理的成绩,这样是缺乏建设性的,也缺乏基本的历史的视角。历史地看,中国环境政策在不断发展完善,环境治理的效果也是明显存在的。设想一下,如果说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都没有通过环境政策实施环境治理的话,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会是一个什么状况,我想毫无疑问应该是更为糟糕。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我们国家的环境治理绩效并不比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差。三是在政策研究中简单地借鉴移植的现象比较多。实际上,公共政策所针对的问题,以及公共政策所存在的社会发展阶段、体制制度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都是有差异的。因此,简单的

公共政策移植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进行政策导向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我们的实际情况。四是参与性的、行动导向的政策研究还有很大不足。我们一些政策研究往往是自说自话，研究者本身参与环境保护的经验很少，与实际工作部门的有效沟通也不足，对于政策倡议也很少有试验的经验支撑。这样，政策建议的指向性、操作性往往都不足。所以说，我们要注意避免政策导向的研究中的种种不良倾向，特别是要端正研究者的观念和态度，使政策研究和设计更加完善，不断提升政策研究水平。

在环境社会学研究过程中牵涉研究者价值倾向的方面还有很多，我这里主要指出了五个方面。我想每个研究者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我们对自己开展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有清醒的自觉，这样既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保证研究者之间理性对话的需要。

以上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围绕环境社会学研究当中如何认识研究对象、如何开展理论建构、坚持一些什么样的价值主张等三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个人认识与体会，敬请大家批评指正。我想，如果我们就这些问题能有更多的共识，那么，我们也许会更好更快地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说明：本文最初为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学术交流所准备，后在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作学术讲演时进行了详细阐述，该次演讲主持人为包智明教授。演讲时间为2015年12月16日15:00-17:00。刘炳林整理了讲座录音，笔者进行了修订。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Objects, Theories and Values

HONG Dayong

Summary: The object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hould be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which have social impacts as well as the social factors which ha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arouse social reaction. Distinctions should be drawn between partial and general factors, between static and dynamic factors, between statistical and sensible factors and between objective and constructive factors.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needs to fully reflect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and a clear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so as to constantly exp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ists should have correct values in such areas as dealing with the evolution trend of environ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justice, the analysis of important environment-related social agents, theory and policy oriented research, etc.

Keyword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ocial factors,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廖国强)